



第四卷

文学史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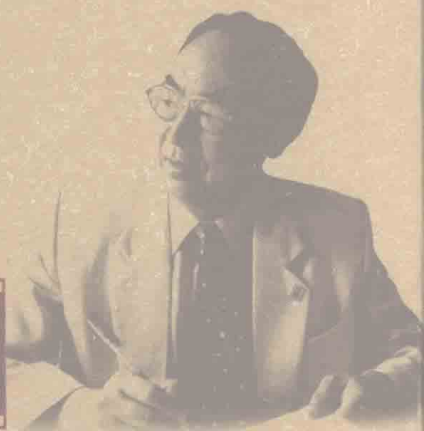
古代与近代作家作品论

现代文学史论

当代文学史论

文学研究史论

张炯文存



湖南大学出版社

代与近代作家作品论

现代文学史论

当代文学史论

文学研究史论



张炯文存

ZHANGJIONG
WENCUN DISIJUAN

第四卷

文学史论（下）

湖南大学出版社

目次

古代与近代作家作品论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论宋末诗人谢翱的文学成就/3

论《三国演义》/8

论李伯元和他的《官场现形论》/23

论刘鹗及其《老残游记》/31

现代文学史论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百年中国文化反思/37

百年中国文学的深刻嬗变/52

正确认识我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69

论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88

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文学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而作/99

我国抗战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111

发扬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

——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六十五周年/118

人文精神与二十世纪文学/129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的问答/136

中国新文艺与中国共产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147

坚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159

新文学评价的历史主义问题/175

当代文学史论

世界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185

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

——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202

文学前进中的反思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231

新中国文学五十年

——为越南《文艺报》而作/247

新中国文学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255

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实主义/263

攀登与选择

——40年文学若干侧面的回顾/273

关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审美反思/290

走向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307

新时期文学的行程及特点/317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困顿/328

90年代我国文学的走向与选择/340

新中国文学的成就与历程/351

我国当代文学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83

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402

文学研究史论

迎向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419

迎向 21 世纪的文学理论批评/427

全球化与中国文论的发展道路/433

文学理论批评在前进

——2001 年文学理论批评一瞥/442

2003 年文学理论批评一瞥/455

新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480

关于新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问题/498

古代与近代作家作品论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论宋末诗人谢翱的文学成就^①

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皋羽，原籍福建长溪，后徙浦城。文天祥起兵抗元，他曾率乡兵数百从之，被授谏议参军。后文天祥兵败被执，就义于元大都。其浩然正气不独激励时人，而且真正做到“留取丹心照汗青”，永为后人所景仰。谢翱则遁迹民间，浪游江浙，冀图再起，无奈大势不可挽回，终至漂泊异乡，曾卜居杭州西湖，贫病至死，友人葬之于严子陵钓台附近之云源山阿。

长溪即我的故乡福安。《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三十四、《福宁府志》卷二十二《福安忠节》、《福安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均有谢翱传。对此，郑贞文氏曾有考证。邑人现从族谱查到谢翱的生地和祖居是在福安穆阳白云山北麓的晓洋村。

谢翱生于公元1249年，卒于公元1295年，享年不过46周岁。据载，他于19岁举进士不第。文天祥生于1236年，起兵抗元是在1276年。则谢翱加入文天祥的队伍不过27周岁。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室飘摇，在元军大举南侵下，迅速土崩瓦解。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燕京四年，不屈，47岁被杀。文天祥比谢翱年长13岁。可见，谢翱大约于30岁即成为宋室遗民，过着15年左右不甘亡国的漂泊生涯。他留下的《唏发集》，计有诗8

^① 原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

卷，散文游记2卷，又遗集上下两卷。收有宋铙歌鼓吹曲12首，宋骑吹曲10首，古体诗104首，近体诗79首，记13篇；遗集卷之上收有杂诗53首，卷之下收有游记《金华游录》和补录的诗《续琴操哀江南》4首。他的这些诗文，除铙歌鼓吹曲和骑吹曲等少数写于从军前外，从内容看，大多均作于漂泊吴浙的十多年间。可以说，不仅形式多样，题材也相当丰富。他也写少量七言绝句，大多都是古近体五言诗。前人认为，他的古体诗主要师法韩愈、李贺、孟郊等。确实，他的诗多不似宋人长于义理，颇有唐风而富于想象，既有壮志未酬的悲凉慷慨，也有耽情山水、放浪形骸的奇思妙想。少数诗作寄情闺怨或握别赠友，也情真意挚，哀婉动人。其遗文多属记游之作，峭拔峻奇。而《西台恸哭记》一文，为登严子陵钓台吊哭文天祥之作，前人多有评注，黄宗羲所作注尤为翔实。在黄之前作注的张孟兼谓：

登西台恸哭记者，粤谢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值国亡，数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倜傥有大志。会丞相开府时，仗策军门，署以为谘议参军。后丞相死，翱恸知己之不复，故登台，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西台者，子陵之西台也。始翱哭于夫差之台、勾践之国。又于此升台而哭者，亦登见践华之意。

张称他是粤人，似属伪托。黄宗羲的注，说明此文既祭文天祥，何以要托言祭“唐宰相鲁公”的缘故。在元代蒙古人的统治下，为文要避讳托言是必然的。这些诗文，所怀亡国之痛，悲愤莫名，正是读之感人至深！

在古代，福建本来文化并不发达。东晋以降迄于唐宋，中原文化不断向南传播。而宋室南渡，百多年的偏安，则使江南的文化比以往更昌盛起来。朱熹到闽北一带讲学，加上建阳等地盛产

纸张，印刷业繁荣，书肆林立，成为东南一大出版中心。这就使福建士人辈出，文风大炽。这种时代背景才可能使局处闽东北的士人中产生像福安谢翱和连江郑所南那样的人才。可惜，他们都生不逢时，适值宋代末世，不得其用。但在宋亡之后，他们都不肯仕于新朝。毁家之痛，亡国之恨，使这些具有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只好遁迹民间和草莱。或托于诗，或托于画，在元代高压的统治夹缝中，赍志以终。

谢翱之所以垂名于后世，很重要的一点正在他的高风亮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尽管饱经忧患却始终如磐石般屹立于世的原因。对于反抗侵略、保卫家园、保卫民族的生存权利而言，爱国主义永远具有自己的正义性。它是为国家民族集体利益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的表现。因而，只要民族国家存在，这种精神就是不朽的，并且永远会被子孙后代所珍视。比之王公大臣来说，谢翱不过是个布衣。可以说，宋王室并未有恩于他。但一旦面临国家危亡，他却能挺身而出，毁家纾国难，而且宋亡之后，还念念不忘故国，这种情怀正是极为高贵的。民族气节向被儒家视为大节。谢翱的诗文得以传世，除了它的艺术价值外，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就在于它有很高的思想价值。《登西台恸哭记》固然悲愤苍凉，令人读之有风高气栗之感；他的许多诗句，也往往让人感到声如裂帛，悲恸慷慨的爱国情思感人肺腑。如致友人何大卿诗中便有这样的诗句：

西台忆故人，野祭忽如梦。仰视浮云驰，不觉哭之恸。

这明显与哭西台有关。而《哭所知》一诗，更明白是为哭文天祥而作：

总戎临百粤，花鸟瘴江村。落日失沧海，寒风上蓟门。
雨青余化血，林黑见归魂。欲哭山阳笛，邻人亦不存。

还有《书文山卷后》一诗：

魂飞万里后，天地隔幽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
丹心浑未化，碧血已先成。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

这无疑都属悲愤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之作，足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感人篇章。

他的《过杭州故宫》二首，就有这样的七言绝句：

其一 禾黍何人为守阍，落花台殿暗销魂。朝元阁下归来燕，不见前头鸂鶒言。

其二 隔江风雨动诸陵，无主园池草自春。闻说就中谁最泣，女冠犹有旧宫人。

一种山河破碎、物是人非或人旧物非的感慨，流淌于字里行间，大有安史之乱后杜甫名句“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的感人效果。而他的《散发》一诗：

乾坤一楚囚，散发向沧州。诗病多于马，身闲不似鸥。
因看东去水，都是夜来愁。晚意落花觉，残枝香更幽。

更仿佛是他后半生的自我生活写照，愁病交加，看似身闲自由，实则有如楚囚般不自由！

谢翱的山水诗一如他的山水游记那么出色，也充满了对国家、对自然的热爱。有的诗更想象丰富而奇特，大有李白之放达疏狂。如《南望天台诸山》一诗：

镜面小蓬岛，入剡脱我骖。舍擢来沃州，下岭见精蓝。
修眉游天姥，天台在其南。良游爱九日，巾堕发不节。醉浮秋夕英，饥食决明实，远寻竺僧迹，俯仰千载陈。狂呼许元度，王谢十八人。仿佛川谷应，草木皆冥冥。便欲即之语，又疑物所凭。闭日游太初，寥廓以为邻。

这诗不但视野高远，诗境开阔，而且遨游山水之间而思接千载，与古人对语，与山川呼应，气魄之宏大狂放，实为南宋诗人

所少有。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可说是至理名言！谢翱的作品大多沉郁悲怆，正跟他的时代密切相关，也与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多半读过老庄的哲学，因而不免有道家的思绪。隐逸山林，寄情于大自然，正是老庄一脉的流韵。所以，谢翱诗文中又有相对旷达的一面。而“人本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所以他的诗中又有题材众多的其他作品，这也不足为奇。据载，明初，《晞发集》尚有百卷，而后有许多便失传，这实在是我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但他的著作又毕竟有这许多存留下来，足称不幸中之大幸！毫无疑问，谢翱的作品不仅是我的故乡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难能可贵的文化遗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深入研究他的诗文著作。福安市谢翱研究会的成立，一定能够更好地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从而也能更广泛地阐明这一爱国诗人和作家的文学成就的意义，以期我国人民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贫病不移地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传统。

论《三国演义》

—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广大人民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所以这样深入人心，因为它是在人民的土壤中发育成长的。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早在唐代就为人民所广泛传诵了。至宋朝，不仅更为流行，而且有了“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苏东坡《志林》：“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泉（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又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这都是明证。由此可知，宋代瓦舍已有说“三分”的专家了。到了元代，三国故事不仅盛传，而且已被人民搬上了戏曲舞台，据《录鬼簿》、《涵虚子》所记和孙楷第先生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金院本和元杂剧已大量演出三国故事戏，如《赤壁鏖兵》、《七星坛诸葛祭风》等，不下数十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元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平话五种》之一，书藏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已由

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这是多少代民间艺人在长期说话过程中结合人民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艺术成果。全书八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上下二栏，上栏为图，下栏述事，从桃园结义始，到晋王统一终。从故事内容和结构上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了。且有着显著的民间文学特色，有鲜明倾向，结构宏伟，故事性强。可是文字粗简，语意不畅，人名地名时有误写，如糜竺作梅竺，新野作辛冶等。另外有些情节，如刘备落草、张飞杀狗等，都是荒诞不经。虽然话本的艺术价值不很高，但在研究讲史文学上有其重要价值，特别是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很显然，从晚唐到元代末年的将近五百年的长时期中，是人民（包括民间艺人）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和美学理想，创造了三国时代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奠定了《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和艺术性的基础。罗贯中则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根据正史，兼采野史、传说、传闻和戏曲，经过自己的虚构想象和组织安排，把《三国志平话》改编成一部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通俗历史小说，不仅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罗氏能吸取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贯，使自己的天才和人民的智慧相结合，完成了这样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长篇巨著，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几百年来由正史人民间，经过人民的加工创造，再由话本、戏曲回到文人手里的集体创作。

罗贯中，名本，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我们知道，贾仲明是元末遗民，他的《续录鬼簿》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他说至正甲辰

(1364) 还晤面过，又属忘年交，说的较为可靠。前人对罗氏的籍贯、年代的异说，至此始能确定。他虽是一个不得志的江湖流浪者，但他在文学上却有杰出的贡献。他是一位著作丰富的艺术大师，也是首先献身通俗文学的作家，虽然他也做过戏曲，写过乐府隐语，但他的毕生精力主要贡献在小说创作上。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等著作。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屡经后人增损，原作的面目不易见到了。至今能看到比较接近他原作面目的，要算《三国志通俗演义》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年（1494）序本，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共94卷，240则。每则用七言句的小目，这是继承话本的形式。罗本与平话本不同之处，摘要举之，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增加篇幅，改正文字，提高了语言艺术水平。

第二，削落荒诞不经的成分，如开卷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因果报应一段，完全删去。

第三，添进有用的正史材料和诗词书表，使得历史性更加浓厚。

这样一来，罗氏的书确是做到了“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程度。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旧的话本从此也就湮没无闻了。同时新刊本也纷纷出现，至明末不下有几十种，但都以罗本为主，只不过做了些音释、插图、批评或增删文字、回目、卷数等表面工作而已，改动不大。直到清康熙年间毛宗岗（江苏长州县人），他学金圣叹改《水浒》、《西厢》的方法，把罗本加以增删改削，如改正内容，辨正史事；整理回目，改为对偶；增删诗文，削除论赞；注重辞藻，修改文词等。并加上批评，称为《第一才子书》。经他改作后的《三国演义》，无论在内容上、形

式上都较罗本更为完整，但正统思想也更为浓厚了。达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也是三百年来在社会上流行的 120 回的毛本《三国演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家出版社翻印了它，发行的数量超过了以前社会的任何时代，这充分说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典文学遗产才能发扬光大，才能交还给人民。

二

《三国演义》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罪行，反映了人民乱离、饥饿、死亡的悲惨生活，以人民的爱憎态度对统治者进行了肯定和否定，表达了人民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愿望。

本书一开始，作者就指出由于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宠信宦官，以致“朝政日非，天下人心思乱”，逼得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但不久就遭到统治阶级的地主武装力量的血腥镇压；也就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军阀。他们各据一方，为了集团的私利互相吞并攻伐，掠夺和残杀人民，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例如：

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

——第 4 回

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社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

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士手执白刃，于路杀人。卓（董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

——第6回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那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就是幸免于屠刀的人民，也由于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生产的荒废，不是冻饿而死就是挣扎于死亡的边缘。人民在这种乱离、饥饿、死亡的惨痛生活下，怎能不切齿痛恨暴虐的统治者呢？怎能不盼望除暴安民、统一国家、平息战乱、使人民能安居乐业的英雄呢？作者就从人民的这种共同的爱憎基础出发，描写了当时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三国演义》中的各色人物。所以《三国演义》的现实精神和人民性，通过这些人物具体地表现出来了。

首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种种罪恶及其丑恶本质。作者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使他成为统治阶级的化身，以便更有力地鞭挞他们，使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和憎恨他们。在作者笔下的曹操，确是一个奸诈凶恶、口是心非、多疑好忌、损人利己的暴君。奸诈和残暴贯串了曹操一生，这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由于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在假仁假义的掩盖下，进行他的“诈术”。如他因疑心而杀害吕伯奢的全家；因缺军粮而借管粮官王垕的头来定军心；因防范行刺而“梦中”杀近侍；以及用“割发权代首”等方法来迷惑群众，骗取人民对他的信任。这正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伎俩。他也就在这“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损人利己的诈术下，踏着人民血铺的道路，爬到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一旦他的欺诈手段无法使用时，残酷狰狞的面目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请看他攻陶谦时的行为：